

The Review of New Political Economy

汪丁丁 主编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11

汪丁丁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

罗小鹏 中国改革的新思路

潘士远

罗德明 会首质量、互助会的倒会风险、得会价格折价与规模

杨 奔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The Review of New Political Economy

汪丁丁 主编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11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11 / 汪丁丁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308 - 06483 - 5

I. 新… II. 汪… III. 政治经济学 - 文集 IV. F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3158 号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11

汪丁丁 主编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王志毅 楼伟珊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浙大路 38 号 邮政编码 310027)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9.5

字 数 167 千字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一版 2009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06483 - 5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论文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 ◆ 汪丁丁 · 1

中国改革的新思路 ◆ 罗小鹏 · 14

会首质量、互助会的倒会风险、得会价格折价与规模

——基于浙江省的实证分析 ◆ 潘士远 罗德明 杨奔 · 49

FDI 流入的“正效应”审视及外资企业 TFP 测算

——中国转型时期的资本支持与技术外溢的分省数据检验 ◆ 周靖祥 张宗益 · 79

预算赤字控制的政治学与经济学——政策问题与研究问题

◆ 爱德华·M. 格拉姆利克
王志毅 译 · 104

学习与思考

以过程为中心的经济方法论转向 ◆ 刘业进 · 121

贝叶斯理性与当代功利主义伦理学 ◆ 赵亚奎 · 135

会议简讯 ◆ · 148

CONTENTS

Papers

What Kind of Economics Fits China? ◆ *Wang Dingding* • 1

A New Approach of China's Reform ◆ *Luo Xiaopeng* • 14

Initiator's Quality, Default Risk, Bidding Discount, and Size in the Roscas:

Evidence From Zhejiang Data ◆ *Pan Shiyuan, Luo Deming, Yang Ben* • 49

To Examine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FDI-Inflows and Measure the TFP for FDI Enterprises:

Based on Empirical Study with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the Angle of the Support of
Capital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 in Transition Period of China

◆ *Zhou Jingxiang, Zhang Zongyi* • 79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Budget Deficit Control:

Policy Questions and Research Questions ◆ *Edward M. Gramlich*

Translated by Wang Zhiyi • 104

Learning and Thinking

Methodological Transition in Economics: Focus on Economic Process ◆ *Liu Yejin* • 121

Bayesian Rationality and Contemporary Utilitarian Ethics ◆ *Zhao Yakui* • 135

Conference Review ◆ • 148

论文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

◎ 汪丁丁*

摘要：本文首先澄清了中国转型期的三重性——“文化—经济—政治”，以及这一转型期经济行为的特征。其次，鉴于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和指导中国转型期经济行为与公共政策时发生的理论困难，此处提出的替代方案是作为“演化社会理论”一部分、适用于中国转型期社会的经济学的特征刻画。第三，与此相关的，是晚近发表的演化社会理论的学术文献综述，以及基于这一综述的对未来研究方向和可能得到的结果的描述。

关键词：演化；社会转型；经济学

引论 中国“文化—经济—政治”转型期的界说

中国社会目前所处的时期，与目前史料所描述的中国社会长期的演变状况相比，应称为“转型期”。根据最常见的看法，这一转型期始于鸦片战争——此为“外因说”。根据另一种看法，这一转型期始于明末或南宋——此为“内因说”或“外因—内因”说。何谓“转型”？这是要求澄清的第一个问题，虽然它未必有明确解答。

人类在“人科”之内的历史，若是从四足猿演变为两足猿（纤细型南方古猿）的时代开始计算，大约超过了600万年。若是从树栖人猿首科开始计算，大约超过3000万年^①。不难推测，如此漫长的历史，在外部与内部因素的作用下，应由许多转型期和稳态期构成。所以，只要延续的时间足够长，人类的每一个“社会”（家庭、洞穴、部落及群体的其他形态）都可能经历转型期。

稳态与转型（“过渡过程”），是工程学的术语。这里首先需要定义但通常很难定义的，是“状态”（states）——世界的状态^②，也就是将静态的世界嵌入于动态的过程内。这里涉及的，

* 汪丁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演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本文作者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7年度重大项目的资助——该立项课题的项目批准号：07JJD790124。

① John C. Eccles, 《脑的进化》，潘泓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4—23页。

② Jurgen Jost, *Dynamical Systems*, Berlin: Springer-Verlag, 2005, pp. 1–6. (科学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

是哲学家和物理学家论证过的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在动态的世界观念里,有空间和时间,两者相互依赖,称为“时空”。在静态的世界观念里,每一主体感受到的每一事物与这一事物在这一主体其他时刻的感受无关,从而,“主体”自身也只不过是一系列原本相互无关但可由联想或假设产生关联的感受。不论如何,我们通常持有的,是动态的世界观。

在动态世界里,每一时刻,主体的认知范围,可称为那一时刻的“世界”^①。认知主体对特定时刻的世界的感受与表达,假如能够量化,或可表示为一组“量”的关系——每一关系可视为从感受世界到量化世界的一次映射^②。这些数量关系当中,相互之间有依赖的可称为“变量”,对其他变量发生影响但独立于其他变量的可称为“参量”。

基于尼古拉的库萨及在他之后的莱布尼茨的看法,当主体感受到世界在此时与在彼时有差异时,就定义了这两个不同时刻及同一世界的不同状态。这一感受,在量化世界里表达出来,就是变量和参量依时间变动的过程。假如主体对“时间”的感受可以量化,则任一时刻,上述的那一组数量关系就定义了世界的一个状态。又如果在认知主体的感受中,世界在此时刻的状态依赖于世界在彼时刻的状态,则世界是演变的。因此,我们可以隐含地定义:如果“过去”影响了“现在”,那么世界是演变的,虽然只是根据某一理论,我们才可区分时间的过去与现在。

在我们感受的量化世界里,如果描述了世界状态的那些变量的变化速度不均匀,那么,仅当它们的变化速度能够被称为“零”的时候,世界处于“稳态”时期。在任意两个稳态时期之间的时期,称为“转型期”。

此处需要几点说明。首先,“我们的感受”,它要求主体之间的交往——即“社会交往”,并要求在这一交往过程中的一群主体——称为“群体”,能够达成他们关于世界的感受的一些“共识”。

其次,我们每一个人感受世界的量化通常有许多变量和参量。例如,马赫曾将“心智”视为一组变量,与那些刻画着外部世界的变量相互作用^③。那么,当我们认为世界的状态不再是稳态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是心智变量的转型期(内因说),还是心智的外部世界变量的转型期(外因说)?

与此相关的是,第三,在我们能够讨论两个稳态之间的转型期之前,从第一个稳态,在那

① M. J. Osborne 和 A. Rubinstein,《博弈论教程》,魏玉根译,高峰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1—64页。

② 汪丁丁,“概念格、互补性、塔尔斯基不动点定理”,《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

③ Ernst Mach,《感觉的分析》,洪谦、唐钺、梁志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3—16页;《认识与谬误》,洪佩郁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5—18页。

些变量已被视为不变的时刻,什么样的力量使这一世界再度发生了变化呢?遵循系统工程学的习惯,我们假设“参量”是系统从一个稳态过渡到另一个稳态的最终原因。由前所述,这些参量可以是心智的也可以是心智外部的。

目前,中国社会经历的这一转型期可称为“三重转型”^①,其一是文化的,其二是政治的,其三是经济的。与其他社会经历过的转型期相比,中国社会这一次转型的主导因素是经济的——不论是旧体制之瓦解还是新体制之尝试。

人类之为“社会性哺乳动物”,基于其社会性而有了“个性”与“群性”这两方面的心性特征,又基于其哺乳动物的特性而有了“情感”。人类的脑,在“脊椎动物—哺乳动物—灵长目”的数亿年演化中,形成了三套由低级到高级的基本结构——分别被称为“爬行动物脑”、“哺乳动物脑”、“大脑皮质”。既然如此,这三套结构之间或许会有冲突。例如,在目前这一演化阶段,根据脑科学家勒多克斯的阐释,人脑内的哺乳动物脑结构与新脑结构尚未完全相容,于是每一个体都可因内在冲突而自杀或癫狂^②。另一方面,虽然没有明确的数据表明人脑内的爬行动物脑结构与哺乳动物脑结构之间存在着不能自发协调的冲突,我们仍可假设它们之间有冲突的可能性。因为,就每一个体而言,确实存在着情感与生理之间暂时失调的情况。例如,情感创伤可导致生理系统失调,反之,生理疾病也常导致情感的紊乱。

情感的表达,称为“情感方式”,需要借助姿势、表情和言语(声音、话语、文字及其他类型的符号)。因此,情感方式是文化的一部分。有情,然后有人心^③。心为思之官,人心发动,始有思想。思念与想象,引发欲望,然后有行为。

强以类别,任一行为,约可名之: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情感的和信仰的。虽然,其间互有重叠。经济行为旨在供养身体、维持再生、延续物种。政治行为旨在表达群体诉求、调解利益冲突、于群性之中升华个性。社会行为泛指个体之间一切非功利性质的交往^④,旨在缓和由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所积累的不适宜性。情感行为首先是私人性质的,幸福、悲哀、恐惧,

① 汪丁丁,“中国经济的特质”,收入《直面现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15页。

② Joseph LeDoux, *Synaptic Self: How Our Brains Become Who We Are*, New York: Viking, 2002, pp. 307—323.

③ 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讲义Ⅱ:社会思想与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二讲,第11—23页。

④ Georg Simmel, “How is Society Possibl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6, issue 3 (Nov., 1910), pp. 372—391; “The Problem of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5, issue 3 (Nov., 1909), pp. 289—320; Frank H. Knight, “The Sickness of Liberal Society”, *Ethics*, vol. 56, no. 2 (Jan., 1946), pp. 79—95.

称为“原初情感”；内疚、焦虑、嫉妒、怨、悔、惆怅等，称为“次级情感”。最后，有一种特殊情感，称为“信仰”——超越个体生命和有限时空的永恒感。

诸如经济行为这样的人类活动，引出了文化的另一部分，更接近钱穆先生阐释的“文明”概念，可称为“生活方式”，即个体和群体生活的可被表达的诸种形态。故而，我们可将“文化”视为情感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综合体。所谓“生活方式”（the way of life），相对于“情感方式”（the way of feeling）而言，是更为外在的和更具物质性的，例如经济生活的形态和政治生活的形态，依外在环境的不同而有重要差异，导致了不同的文明。与“文明”相比，情感方式是更为内在的和更具精神性的，例如信仰的形态和审美的形态，依内在体验的不同而有重要差异，导致了不同的伦理与宗教。

当不同的文明相互接触时，每一文明之内的人据以判断“异己”文明的，无非是他自己的情感与生活能够提供的判据，也就是他的文化传统能够提供的判据。因此，所谓“文明的冲突”，无非是不同文化传统所提供的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之间发生的冲突。

当代中国社会的三重转型，始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近代转型，始于中国文化传统近代转型之艰难性——由器物至制度，再至文化，直至追溯文化传统之根源，始知“全盘西化”实不可能，故重返制度层面，寻求适合于中国人的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制度。这样一种“思想循环”，在100年里发生了两次——当然是“循环式上升”的过程。只是在“集中计划制度”的社会实践被普遍认为彻底失败了之后，中国才转向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市场化的制度实验。这一转向被称为“经济转型”，通常认为需要50年才可完成，因为经济转型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行为及政治行为方式（即政治体制）的转型。

由于前述的100年思想循环及中国文化传统的近代转型的累积效应，在1990年代中期被再度解禁的市场化过程的冲击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迅速地西方化并与其内在的情感方式发生并积累了严重的冲突^①。每一个中国人，不论他持有自由主义立场还是新左派立场，或无法在一切问题上自治地坚持任何一种立场，甚或在任一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可表达的立场，总之，与前述的思想循环不同，现在，他的生活方式已经与他的情感方式严重离异，故而他不可能借助西方人的任何立场来化解这一冲突。为化解这一冲突，中国需要有“本土的”社会科学——植根于本土问题意识并且具有普遍主义视角的社会理论^②。

① 汪丁丁，“简论王元化先生自由主义思想的复杂性”，《财经》（网络版），2008年5月16日，www.caijing.com.cn/20080516/62371.shtml。

② 汪丁丁，“关于出版‘中国社会科学丛书’的设想”（原载《中华读书报》1997年7月），收入《通向林中空地》，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40—344页。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构成了植根于本土问题意识的中国社会理论的一部分。提出并说明这一问题的求解方向,是这篇论文的主旨。

以下的论述分三节:第一节列举理由说明中国社会转型期行为之经济学特征可概括为“短期化倾向”,第二节描述中国转型期社会所需经济学的理论特征,第三节试图刻画中国转型期经济学的演化理论特征。

一、中国社会转型期经济行为的特征

在如上所述的文化转型期之内,中国社会的经济转型是两方面的。首先是经济活动的协调机制,正从传统的中央计划模式转变为现代的市场导向模式。其次,与西方稳态社会的市场经济相比,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正从初级的所谓“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力图转变为高级的所谓“投资与创新驱动的经济”^①。

刚刚过去的30年,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过程。故而,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是这一过程的趋势——我们应将以往100多年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变化视为阶段性制度实验的后果。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基于民众在1949—1979年期间计划体制之下的生活体验,自由市场作为一种经济机制,在1979—1989年期间的中国社会里获得了自我实现的巨大动力。与此同时,自由市场明确地要激发和试图满足每一个卷入市场生活的人的私欲——它在许多方面是阴暗和具有破坏性的——并因此使资源配置变得更有效率。

虽然“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没有明确界定让谁先富裕起来,但内置于自由市场机制的效率与私欲之间的逻辑关系意味着,那些更少限制地追求私欲并懂得借助于他人私欲的人将会先富裕起来。这样,始自1990年代中期,我们感受到了因改革之初权利的分配不公平和权力的无监督状况而导致的“病态市场化”过程中,大众对财富的不公平配置(所谓“以权谋私”或“腐败”)的普遍不满^②。

这里,“中国问题”呈现出它的复杂性。首先,一方面,为最终提高我们每一个人的福利水平而引入的市场机制,确实远比政府机制更有效率,并因此而获得其道德合法性。另一方面,与市场机制内在的分配不公平的积累同时发生的,是转型期政府因履行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重职能而难以避免的腐败行为,并因此而侵蚀了市场机制的道德合法性。在任何社

① 汪丁丁,“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与思考”,《经济研究》,1994年第7期。

② 汪丁丁,“中国九十年代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原载《二十一世纪》第53期(1999年6月号)),收入《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33页。

会里，任何制度得以持续的前提是道德合法性^①，然后才是政治和法律的合法性^②。

其次，转型期政府之所以难以避免地发生腐败行为，是因为上述的那种病态市场化的过程已经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足以瓦解计划体制的行为规范和那些尚未被计划体制摧毁的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其实，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在过去的 100 多年里，在远未完结的“文化转型”过程中，大致瓦解殆尽。孔子曾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政治秩序的模式。当代中国在“去伦理化”的市场化过程中展开的，则是一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社会图景。

第三，为缓解因政府行为腐败而积累的普遍怨恨，与基于市场机制的经济发展同时进行的，应当是一个旨在纠正病态市场化过程的基本自由权利和公民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是，如博兰尼曾指出的那样，民主是政治艺术，它的普及与成功极大地依赖于参与民主政治的大众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这门政治艺术^③。否则，如哈耶克反复告诫的那样，民主便很容易蜕变为多数人的暴政，它将损害自由，并且长期而言它也将颠覆民主^④。

第四，由于上述的“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和“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教育被认为是普遍地失败了^⑤，这也意味着未来参与民主政治的大众所需的道德熏陶与政治修养的普遍缺失。

第五，如怀特海所论，任何观念在可能被正确地理解之前，必须被正确地表达^⑥。源自西方社会的自由与民主等观念，尚未在中国文化中获得它们的正确表达^⑦。

以上诸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转型期政治的基本特征——既不能实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完全开放的民主制，又不能返回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完全封闭的集权制。所以，中国的市场经济更经常地是在前景不明的政治和政策环境中运行的，从而经济行为普遍地表现出短期化倾向——经济学的描述是“关于未来收益的过高的折现率”。

工业的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规模经济的原则。为取得更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工业家们试

① 汪丁丁，“市场社会的道德基础”（原载《公共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收入《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70—92 页。

② 汪丁丁，“探索法治中国的法与经济学”，收入《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55—161 页。

③ Michael Polanyi，《个人知识》，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78—81 页。

④ Friedrich von Hayek，《哈耶克文选》，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308—309 页。

⑤ 汪丁丁，“知识社会与现代教育的双重困境”（原载《财经》，2002 年），收入《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18—130 页。

⑥ 怀特海，《思维方式》，刘放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5—25 页。

⑦ 汪丁丁，“民主的要素及其文化表达”，收入汪丁丁主编，《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三卷·第三期），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11 页。

图将社会生产的一切方面“标准化”——以统一的外在尺度衡量原本不同的质,从而生产的平均成本得以不断下降。在市场价格与平均成本之间,工业家们获得利润。因此,市场竞争——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成为工业家们获取规模经济效益的最符合“工具理性”的驱动力量。越是竞争激烈,工业家就越是具有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特征。每一种投入或产出的标准化,也就是专业化过程。物质资本的专业化过程往往要求持续和巨大的研发努力,人力资本的专业化过程往往要求相当长期的正规学校学习(主要生成通用型人力资本)和在职培训时间(主要生成专用型人力资本)。

若设任意两个主体甲和乙的有效率的经济合作所需要的“合作专用型”(故其成本是所谓“沉降成本”)人力资本及与它相配套的物质资本的专业化程度 S 要求双方合作的期限至少是时段 T ,也就是说,仅当 T 小于甲和乙预期的可持续的合作期的长度 Z ,实现 S 才是理性的。那么,在经济行为普遍的短期化倾向的影响下,若 $Z < T$,则合作的专业化程度 S 普遍地无法实现。

要实现较高水平的 S ,合作各方可通过三种途径满足条件 $Z > T$ 。首先是“自律的力量”,不过,对于转型期社会而言,这一途径成本极高。其次是“外部的强力”,例如政府和黑帮。第三,其实是自力与他力的混合,合作各方之间或许有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或业缘关系,这些关系可能支撑较长期的合作。

上面的分析意味着,在中国转型期社会里参与日常经济活动的企业大致可划分为四类:首先是许多规模较小且专业化程度较低的家庭和乡镇企业,其次是数目不大、规模较大且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国有企业,第三是与政府保持隐秘联系并因此而获得较长的合作预期从而具有较高专业化程度的大型非国有企业,最后是借助国际力量保持足够长的合作预期的大型外资企业及合资企业。

在上述各类型的企业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普遍受到短期化行为影响的人。即使是大型企业,只要层级结构足够复杂从而监督成本足够高,雇员的行为就会表现出短期化倾向。

如前述,短期化倾向的经济学描述是“关于未来收益的过高的折现率”,这是中国转型期经济行为的第一特征,也是唯一涵盖了其他转型期现象的特征。

经济学或行为经济学共有的一项研究结论是,未来收益的折现率与未来事件的不确定性成正比(所谓“risk-effect”)①。此外,行为经济学的一项研究结论是,未来收益的折现率与未来事件的跨期长度成正比(所谓“time-effect”)②。

① Richard H. Thaler,《赢者的诅咒——经济生活中的悖论与反常现象》,陈宇峰、曲亮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6—99页(第八章“跨期选择”)。

② A. Lazaro, R. Barberan, E. Rubio, “The Discounted Utility Model and Social Preferences”,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vol. 23 (2002), pp. 317–337.

当代中国社会的许多现象，从商品假冒伪劣到教育与医疗的混乱状况，从官员腐败到家庭与婚姻关系的瓦解，从自然环境的过度污染到文化遗产的迅速耗竭，都可解释为未来收益的过高折现率所致。大致而言，凡涉及物质方面未来收益的合作行为，都可因这一特征而发生短期化行为并导致合作崩溃。

二、转型期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征

目前在大学教育和政策基础研究中占据了主导位置的经济学，常被称为“西方经济学”，确切而言是芝加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诸流派之一。很遗憾，长期以来与新古典经济学抗衡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未被充分地引介给中国政府和民众。

芝加哥学派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观是静态的，从而它的理论可能获得逻辑的彻底性。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世界观是动态的，从而它能够容纳知识与制度的演变，尽管它无法获得逻辑的彻底性^①。

静态世界的经济学，它的核心概念是“均衡”——局部的或整体的。围绕这一概念所发展的分析方法，称为“比较静态分析”，它要求参量的变动幅度足够小。

均衡意味着不存在足够大的诱惑使任何变量偏离既有状态。转型期社会，心智的变量和心智外部的变量都处于迅速变动的时期。解释这一时期的经济行为，由于下列三方面的理由，静态的分析工具往往无能为力或使人误入歧途。

首先，转型期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格局不仅在迅速改变而且依赖于这一特定社会的历史。所谓“历史”，一位当代作者将它定义为“具有事后影响的全部事件的集合”^②。事实上，历史与制度关系密切，而制度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我们之所以感受到“制度”，是因为我们当前的行为受到以往行为的制约^③。

对经济行为影响最大的制度因素是权力和权利的初始格局^④。由于这些初始事件的事后影响逐渐甚或加速的积累过程，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不平等状况可急剧恶化，以致为满足绝大多数

① 汪丁丁，“制度分析的特征及方法论基础”，《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6期。

② Nassim Nicholas Taleb,《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万丹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78页。

③ 汪丁丁，“知识、秩序、悟性浅说”，收入汪丁丁主编，《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三卷·第二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3—140页。

④ 汪丁丁，《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9—355页。

社会成员的正义感而采取的公共政策日益倾向于“剥夺‘剥夺者’”。

其次,在转型期社会,人们的偏好不应继续被假设为“给定的”。这是因为:(1)诸如“幸福”、“正义”、“生命”、“权利”等核心观念的改变;(2)伴随着社会交往的深度和广度而发生的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的增强;(3)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情感方式被纳入到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专业化过程中从而丧失了自我调整和自我恢复的稳定性。

第三,并且部分地由于前两方面的理由,转型期社会的公共政策的一项重要功能是不断地重新设定“初始条件”——即不断实施的旨在实现更多社会成员在更大范围内机会平等的权力和权利的再分配^①。

转型期中国的经济学,若要满足社会需要,就应在上述三方面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甚至应取而代之^②。

三、趋于演化社会理论的经济学

适合于转型期中国的经济学,我认为,它应当是演化社会理论的一部分^③。

这是因为,首先,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经济现象,不论是微观行为还是宏观行为,都与诸如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现象纠缠在一起并且以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改变为参量。其次,即使仅仅考虑中国经济的增长问题,由于技术进步是与经济体制变革同时发生的,我们很难孤立地建构任何种类的“增长模型”及“生产函数”并据以解释中国经济的真实增长。

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内,将“制度”、“技术”、“资源”、“政治规则”和由文化教养塑造的“偏好”视为参量甚至视为内生变量,这将导致“演化经济学”成为“演化社会理论”^④。下面,我将试图勾勒这一理论框架——为要适用于中国转型期社会的前述特征——必须具备的若干特征。

由于中国社会的三重转型期内的“失序”以及因此对任何个体的任何形态的未来收益所赋

① 汪丁丁,“关于‘共享式’改革的新政治经济学”,收入汪丁丁主编,《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二卷·第二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4页。

② 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变迁”,收入汪丁丁主编,《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一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0页。

③ 汪丁丁,“演化社会理论引言”,《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3期。

④ 汪丁丁,“行为经济学基本问题述评”,收入汪丁丁主编,《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四卷·第一期),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

予的强烈不确定性，适合于中国的演化社会理论的第一特征是“涌现”，即较低层次的组织（包括个体生命）之间无序但大量的相互作用所激发的较高层次的组织（包括个体生命）——异质的或同质的，然后，呈现出来的秩序^①。

在关于“生命”的诸定义当中，我采用下面这一定义：（1）生命个体有“边界”，即由某些物理和化学介质界定的范围，或可称为“身体”；（2）生命个体有复制自身的能力——可简单如 RNA 复制过程，也可复杂至“有性繁殖”和更高级的“观念复制”过程；（3）生命个体在复制自身时有变异的可能——可因外界的偶然刺激也可因内在变异的能力。当且仅当这三项要求同时满足时，有“生命个体”。

由一群生命个体组成的“社会”，是这样一种秩序，它从这群个体无意识或有意识的行为的许多不可能预见后果的交互作用过程之内涌现出来，具有稳定或不稳定的“结构”（协调个体之间关系的规则的集合）。因此，根据哈耶克的想法，社会，永远是指一些遵守共同规则并由此在其环境内形成一套行为秩序的个体之集合^②。

注意，对哈耶克而言，当个体行为遵循某些“规则”的时候（如计算机仿真规则），个体自身未必意识到有这些规则。因此，规则应被视为是旁观者对被观察的个体行为的理性化表达。

关于任何一个社会之内的许多生命个体之间的分工与协调的规则，晚近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四项重要结论：（1）生命个体对规则的服从，可能增加也可能降低生命个体以其在所处环境内复制自身的能力为定义的“适存度”；（2）任何一个社会，通常可观察到许多不同的规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互替的也可能是互补的；（3）包含了足够大的随机性或不确定性的社会演化，常使一些规则跃变为其他规则；（4）在不断跃变的过程中，一些规则比另一些规则具有更大的稳定性从而能够长期不变。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与“权力”结构不同，恰好是那些相对而言更稳定的行为规则界定了“权利”体系^③。

以上所列关于规则的跃变及稳定性的结论，也符合我们关于涌现的研究结论^④：（1）能

① John Holland,《涌现——从混沌到有序》，陈禹等译，方美琪校，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45—55页。

② Friedrich von Hayek,《哈耶克文选》，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70页。

③ Peyton Young,“Social Norms”, University of Oxford,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2007, ISSN1471-0498.

④ John Holland,《涌现——从混沌到有序》，陈禹等译，方美琪校，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231—237页，摘录时，有删节。

够产生涌现现象的系统,即所谓“发生系统”,是由那些种类相对较少并遵循着简单规律的一些基本元素组成的;(2)在这样的发生系统中,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换句话说,系统行为的一些规则无法通过直接考察它的各组成部分的规则而归纳出来;(3)发生系统的典型现象是,其组成部分不断改变它们的具有稳定性的行为模式,从而导致系统的自我更新;(4)如此涌现出来的稳定的行为模式,其特征是由它所处的局部环境决定的;(5)当一个发生系统内部的稳定的行为模式的数目不断增加时,这些行为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使系统整体的功能得到增强;(6)这些稳定的行为模式往往可被观察到并被视为“宏观规律”; (7)那些具有足够稳定性的行为模式,能够存活足够长的时间从而积累足够多的资源来复制自身。

晚近发表的基于“囚徒困境”博弈或“公共物品”博弈并带有随机过程、简单随机性、或由遗传算法自发演变的计算机仿真研究^①,让我们看到了下列符合直观且有待进一步完善的结论:(1)在一个“全连接的”(即每一个体与每一其他个体之间有纽带联系)社会网络无法涌现任何新的行为规则,并且在足够长期的演化之后,只存在完全同质的从而毫无“个性”可言的个体;(2)在有局部结构的社会网络里,从随机设定的初始规则,可涌现有效率的行规则——由此可形成合作秩序^②,也可涌现无效率的行规则——由此不能形成合作秩序;(3)由服从合作规则的个体组成的群体可能取代不服从合作规则的个体组成的群体从而增加社会成员的平均福利,也可能被非合作的群体取代从而减少平均福利;(4)一定程度的利他惩罚或“强互惠主义”(即以降低自身适存度为代价针对不合作行为的惩罚)行为可导致合作秩序在群体内的扩展^③;(5)一定程度的强互惠主义行为可导致合作群体在社会内的扩展^④;(6)以特定的规则,一定程度的同情可导致合作秩序在群体内的扩展^⑤;(7)一定程度的“有利则合作—不利则不交

① 汪丁丁,“行为经济学基本问题述评”,收入汪丁丁主编,《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四卷·第一期),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

② Martin A. Nowak, et al., “Five Rules for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Science*, 314, 1560 (Dec. 9, 2006).

③ Christoph Hauert, et al., “Via Freedom to Coercion: The Emergence of Costly Punishment”, *Science*, 316, 1905 (2007); Ernst Fehr and Urs Fischbacher, “Third-Party Punishment and Social Norms”,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5 (2004), pp. 63–87.

④ 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The Evolution of Strong Reciprocity: Cooperation in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s”, *Theoretical Population Biology*, 65 (2004), pp. 17–28.

⑤ 这是王志坚、叶航、罗卫东和汪丁丁在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7年未发表的初步研究结论;关于“同情”与“合作”的脑科学研究报告,参阅Tania Singer and Ernst Fehr, “The Neuroeconomics of Mind Reading and Empath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 no. 2 (May 2005), pp. 340–345.

往”策略可导致合作占优的秩序^①；(8) 个体策略或小群体策略的有效性依赖于周边个体或周边群体正在使用的那些策略的性质，这反映了一个社会里各种策略的“共生演化”及该社会“文化特征”的涌现过程；(9) 个体策略的变异率可以很高从而个体的资源搜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也可以很低从而个体能够迅速专用于它所处的环境，最佳的变异率，在这两极端之间；(10) 在一个社会里涌现出来的稳定策略的序列通常不可逆转，这就是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性”；(11) 在小群体内部占优的策略，可由于路径依赖性而陷入演化死胡同；(12) 噪音或不确定性的增加通常会降低合作水平^②。

任何社会都有“初始时空”，故而有特殊的演化路径。沿着它的特殊演化路径形成的，是它的文化（生活方式与情感方式）的特殊性^③。初始时空的各局部的特征，塑造了许多不同的“个性”并以生命个体为其载体。从这些承载着个性的生命个体的交互作用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是“群性”——许多个体在长期内共同遵守的一套策略（规则以及权利）。一些群性可能取代另一些群性，也可能与它们形成共生格局（文化的多元性）。在长期内保持较高稳定性的那些群性的载体——即交互作用且服从共同规则的生命个体的集合，表达着它们所构成的“社会秩序”^④。

四、简短的结语

在关于“合作秩序”及其自发扩展的数量迅速增加的研究报告中，呈现出未来的演化社会理论的一些特征。这篇文章试图论证，适合于解释（指导）中国转型期社会的经济行为（经济政策）的所谓“中国经济学”，应充分考虑到上述的理论特征。否则，它将因难以容纳制度变迁诸因素而沦为僵化的“经济学教条”——尽管它在西方诸稳态社会里的运用并非教条。

同样的警告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社会的运用，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它甚至更可能沦为教条从而被阉割了它在理论建构时原本具有的演化（辩证法）的灵魂。

① Lorens A. Imhof, Drew Fudenberg, Martin A. Nowak, “Tif-for-Tat or Win-Stay, Lose-Shift?”,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247 (2007), pp. 574–580.

② 此处(8)至(12)参见：Robert Axelrod,《合作的复杂性——基于参与者竞争与合作的模型》，梁捷、高笑梅等译，梁捷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29页。

③ Robert Sugden, “Taking Unconsidered Preferences Seriously”,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Discussion Paper.

④ Robert Sugden, “Spontaneous Orde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3, no. 4 (Fall 1989), pp. 85–97.